

促进还是抑制：涉华新闻报道的“质”与“量”对 OFDI 影响

杨立卓，付佳，吕子明，许青云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 国际舆论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投资壁垒，是我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风险因素，值得高度关注。文章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新闻报道变化和中国 OFDI 流量数据，采用拓展的引力模型，从涉华新闻报道的褒贬度和关注度两个边际，考察了沿线各国涉华舆论对我国 OFDI 的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的舆论褒贬度和舆论关注度对我国 OFDI 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调节效应分析显示：赴华留学人数对舆论褒贬度影响中国 OFDI 有显著的强化作用，东道国受教育水平对舆论关注度影响中国 OFDI 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东道国腐败程度和受教育水平负向调节舆论褒贬度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城市化率和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舆论对我国 OFDI 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关键词： “一带一路”；舆论褒贬度；舆论关注度；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 F752.7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我国不断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不断增多，已成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投资来源地^[1]。尽管遭遇逆全球化、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等影响，2022 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仍逆势上涨，达到 20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占同期总额的 17.9%，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美国和一些西方大国蓄意抹黑中国，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鼓吹“中国威胁论”，谎称中国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帝国扩张”，造成沿线国家陷入所谓的“债务陷阱”，这些故意抹黑的新闻报道使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遭遇了“中国恐惧症”，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投资持有更多的怀疑和谨慎态度¹，国际舆论已然成为一种新型贸易投资壁垒。针对这些现象，本文深入探讨了东道国涉华新闻报道对 OFDI 的影响，研究结论对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地“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有两类：一类是舆论的国际经济效应；另一类是 OFDI 风险的影响因素。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分析舆论的国际经济效应，Kulchina 分析了舆论数量对一个城市吸引 FDI 的影响，认为外国对俄罗斯某一城市的广泛报道会增加这个城市的外国投资者数量^[2]；李钢和孟丽君研究美国国内舆论对进口的影响，发现舆论恶化会导致美国进口下降，但舆论环境趋好对美国进口影响却不显著^[3]；孟丽君和李钢还分析了舆论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4]；程盈莹等分析了国际舆论对我国吸引 FDI 以及对我国入境旅游贸易的影响^[5-6]，还有一些文献从案例和理论角度分析国际舆论对 OFDI 的影响，但鲜有实证分析的文献。同时，已有众多文献从法律、制度、社会、环境、恐怖主义活动、逆全球化等多个角度研究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7-14]，但针对 OFDI 的舆论风险鲜有研究，与本文最接近的文献是张先锋等的研究，他们研究负面舆论对投资的影响，抓取了中国主要

¹资料来源：The Economist. The New Colonialists: China's Hunger for Natural Resources.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0853534>, March 13 2008.

投资伙伴国的主流新闻媒体的社会报道,构造涉华舆论偏向指数来研究负面舆论对我国企业投资的影响^[15],但他们研究忽视了正面舆论和负面舆论对 OFDI 的异质性影响,也没有区分舆论报道数量和舆论语气值对 OFDI 影响的差异性。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数据更加全面和精确,本文利用谷歌 GDELT 数据库提供的大数据构建舆论指标,该数据不仅覆盖中国主要投资伙伴国的主流新闻媒体,还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的 100 多种语言,印刷的、广播的和 web 等各种类型的媒体舆论,能为本文的核心变量(涉华舆论)提供更全面、精准和细致的数据;二是本文区分了正、负面舆论的差异影响,并将舆论分为“量”(舆论关注度)和“质”(舆论的褒贬度)两个边际来进一步拓展舆论对 OFDI 的研究深度,对正、负面舆论的“量”和“质”两个维度对 OFDI 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三是本文探讨了国际教育交流、制度环境、软基础设施、高校入学率对涉华舆论与 OFDI 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期找到扩大正面舆论对 OFDI 的积极影响、抑制负面舆论不利影响的因素;四是通过异质性分析,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是否同属儒家文化圈、城市化率的高低和收入水平进行异质性分析,探讨东道国涉华舆论影响 OFDI 是否存在收入和文化异质作用。这些边际贡献不仅拓展了国际舆论与 OFDI 关系理论的研究深度,也为防范我国企业“走出去”时的舆论壁垒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

二、理论与假设

(一) 国际舆论影响 OFDI 的作用机制

公民对经济事务的看法直接从新闻报道和个人经验发展而来,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又会对公众舆论起到引导作用^[16]。媒体对经济行为的报道不同,公众对经济行为的评价也不同^[17]。东道国媒体对一国的积极报道,会影响东道国民众所持有的观念,投资国正面的国家形象使该国更容易被东道国政府和公众所信任,从而影响东道国与该国的国际经济往来,降低该企业的外部成本^[18],影响该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1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舆论往往受多方面影响,一是受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新闻报道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经济不发达,有的媒体受资金等资源限制,无法直接获取中国的一手资料,往往会对西方媒体的报道进行转载或加工后发布,从而受到西方对我国投资的污名化影响,报道语气语调偏向负面;二是在复杂的市场结构和政治环境下,媒体与企业、政府紧密相连。媒体出于商业利益^[20-21]、政治利益^[22]和维护本国企业竞争优势^[23],其舆论偏向会倾向于东道国本身从而对我国投资企业的报道失去客观性^[24]。无论是通过受西方媒体影响还是东道国媒体自身带来的保护本国企业的倾向,也无论是掺杂着理性或非理性的成分的报道,都会作用于人们的思维与行为^[25],形成东道国对投资国的一种社会评价,进而影响投资国对其投资。

(二) 研究假设

1. 舆论对 OFDI 的影响

(1) 舆论的“质”和 OFDI。媒体报道褒贬度会给读者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民众对某事件的偏好和情绪来影响情感体验^[26],从而影响东道国的民众和企业等对中国的情感态度,进而影响东道国对我国 OFDI 的看法。舆论具有两面型:正面和负面舆论。其中正面舆论是反映社会规律而且总能对人和环境产生积极作用,正面舆论带来良好的国家形

象对 OFDI 有促进作用^[27-29]；而负面舆论易造成对事物认识偏差，形成对投资国国家和企业的消极印象，从而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都会产生负面影响^[30-33]。由此，本文提出：

H1：东道国涉华舆论会影响 OFDI，积极舆论会促进 OFDI，消极舆论会抑制 OFDI。

(2) 舆论的“量”和 OFDI。新闻报道的篇数是判定信息是否重要的客观标准，报道累积到一定程度将对整体的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31]。东道国的涉华舆论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与其的文化交流、双边经贸往来等频繁程度，东道国涉华关注度越高，有利于加深东道国民众和企业等对中国的了解，缓解信息不完全^[8]，使其对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和目标有更多了解和支持。而且信任度和所获信息成正比，东道国所获关于中国的信息越多越全，其对中国的信任度越高，更能从广泛地信息中获得正面的舆论报道，从而降低了中国企业的进入东道国的“外来者劣势”，有利于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 OFDI。同时，舆论对某件事的关注具有热点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热点新闻出现，民众会对之前的事件遗忘。因此，有如下假设：

H2：东道国涉华关注度会促进中国 OFDI，但随着时间的流失，舆论关注度对我国 OFDI 影响会减弱。

(3) 舆论“质”与“量”的交互影响效应。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舆论报道，当新闻报道数量很大时，会产生扩散效应，并对读者的心理烙下更深的印记，舆论影响力不一样。如果东道国众多媒体对中国某一项 OFDI 进行积极且广泛的报道，将带来更多的受众对中国 OFDI 产生积极的印象，舆论影响范围越广越深刻。同时，大量的报道使读者反复接受这一讯息，会对读者产生的情感刺激程度更大，进而会在对民众心中留下更持久深刻的美好印象^[34]。因此有：

H3：舆论关注度越高越有利于发挥正面舆论对中国 OFDI 的促进作用，但舆论关注度越高也会强化负面舆论对中国 OFDI 的抑制作用。

2. 国际涉华舆论影响中国 OFDI 的调节效应

(1) 国际教育交流。来华留学生是中国故事的“听讲者”和“讲述者”，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35]。一方面来华留学生归国后通过加强中国与东道国信息交流（韩永辉等，2022）^[36]、传播中国文化^[37]，能有效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和文化壁垒，降低双方企业在投资等方面的沟通成本^[38]，从而有助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另一方面，来华留学生作为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学成归国后成长为当地的社会精英和“意见领袖”机率较大，掌握一定的话语权，能讲述真正的中国故事，从而对当地民众形成一定的辐射圈^[3]，因此，赴华留学生会改善涉华舆论报道。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4：赴华留学生会强化舆论褒贬度对中国 OFDI 的促进作用。

(2) 软基础设施。互联网的普及加快了舆论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及普及是舆论传播的载体；另一方面，民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见解，从而加剧了舆论的发酵和传递，让民众能直接的了解真实的中国，获取关于中国的真实信息，拓宽民众了解中国的渠道，从而影响舆论褒贬度对 OFDI 的影响。本文提出假设：

H5：宽带普及率越高，软基础设施越好，会弱化负面舆论对 OFDI 的影响。

(3) 制度。大多数媒体出于经济、政治的考虑，有意地忽略与当地企业、主要政府官员观念相冲突的相关信息^[39]，这种差异性报道加剧了外来企业的“外来者劣势”。政府的

腐败控制能力衡量了公共权力受约束的程度,法律制度给媒体监督功能的发挥提供有力的支撑,给新闻媒体人员提供一个真实客观报道新闻的支撑^[20],从而减少涉华偏误报道的产生,降低中国企业的“外来者劣势”。因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H6: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腐败控制程度会弱化舆论褒贬度和关注度对中国 OFDI 的影响。

(4) 高校入学率。教育给媒体监督功能提供一个软性、长远的支撑^[20],一方面,可以提高新闻从业者的整体素质,提高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教育制度的提高会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国民独立思考能力,降低民众被偏误报道误导的可能性,进而影响东道国涉华舆论的传播以及对经济的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的民众对外界信息的获取能力和敏感都越高,越能更主动的获取涉华新闻报道。因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H7: 教育会弱化舆论褒贬度对中国 OFDI 的影响,会强化舆论关注度对 OFDI 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选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ln ofdi_{it} = \alpha + \beta_1 avgmean_{it} + \gamma X_{it} + \lambda_t + 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ln ofdi_{it} = \alpha + \beta_1 perread_{it} + \gamma X_{it} + \lambda_t + u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1)为舆论褒贬度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式(2)为舆论关注度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其中,下标 i 表示国家, t 表示年份, $\ln ofdi_{it}$ 表示中国在第 t 年对 i 国的直接投资金额, $avgmean_{it}$ 表示 i 国媒体在第 t 年涉华新闻报道的语气均值即舆论褒贬度, $perread_{it}$ 表示 i 国媒体在第 t 年对涉华新闻报道的人均数量即本文的舆论关注度, X_{it} 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γ_i 表示国家固定, u_t 表示年份固定,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二) 主要指标及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东道国每年的直接投资流量。观察数据发现,样本中被解释变量存在 13.64% 的零值和 12.5% 的负值,但是这种情况并非统计等客观原因造成,直接剔除零值和负数会造成样本选择偏差,并且有可能忽略一些重要信息,造成模型估计结果有较大偏差,所以并不能将此类数据去除,本文参照 Busse 和 Hefeker^[31]的方法,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进行如下处理: $y = \ln(x + \sqrt{1 + x^2})$ 。

2. 核心解释变量

与李刚和孟丽君^[5]采用涉华新闻篇幅数量和语气均值相乘并取对数构建舆论指标不同,考虑到新闻篇幅数量和新闻语气偏向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参考已有文献^[7]将舆论分为舆论褒贬度和舆论关注度,即舆论的“质”和“量”两个边际。本文的舆论褒贬度用一国媒体年度所有涉华报道语气均值作为代理变量,语气均值越偏向于正时表明中国在海外舆论越好,越负表明中国在海外的舆论越消极。考虑到新闻报道数量和国内媒体机构成正比,且东道国国土面积越大,人口越多则媒体机构就越多,因此舆论关注度用东道国涉华新闻报道数量比上东道国城镇人口,即东道国城镇人均涉华新闻阅读作为代理变量,经过初步回归,系数偏小,本文将人均涉华阅读数值扩大 100 倍。本文中的涉华舆论指数来自

于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事件开放数据库—GDELT(www.gdeltproject.org)数据库。该数据库给每一篇新闻都标记了一个“sentimentindex”，即本文中的新闻报道褒贬度指数，语气值范围在-100到+100之间，常见的褒贬度指数在-5和+5之间。此外，该数据库记录了全球从1979年至今所有新闻且每15分钟更新一次数据，时刻监控着全球每个角落的100多种语言的新闻媒体：印刷的、广播的和web形式的。

3.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文献，本文选取控制变量如下：中国经济规模（*DGDP*），经济规模越大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意向越强烈^[40]；东道国市场规模（*GDP*），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强^[41]；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lnPGDP*），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越能吸引中国的投资^[42]；东道国城镇化水平（*Intown*），城镇化率越高则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等较好^[43]；东道国双边贸易额（*trade*），双边贸易额越大说明两国贸易投资来往越密切；距离成本（*Indistance*），双边地理距离与企业OFDI负相关^[44]，用两首都间地理距离与平均国际油价的乘积来衡量；东道国营商环境（*Inbusiness*），“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企业的OFDI正相关^[45]，用进入东道国的开始营商得分表示；资源禀赋（*lnnr*），中国OFDI存在资源获取动机，本文用矿石和金属出口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表示东道国的资源禀赋^[46]。

4.调节变量

（1）国际教育交流。参考谷媛媛和邱斌^[37]、袁然和魏浩^[47]的做法，采用来华留学生人数作为中国与东道国国际教育交流的代理变量。由于留学生数据只更新到了2018年，企业教育对经济的影响有滞后作用，本文对来华留学生人数做了一期滞后处理并取对数。（2）软基础设施。本文用东道国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东道国软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3）腐败程度。参考已有文献用东道国腐败控制指数衡量^[30]，该指数数值越低表示公共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越高。（4）高校入学率。高等教育入学率是衡量一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公认指标^[48]，本文用高等教育入学率来反映东道国教育水平。

5.样本选择

由于新冠疫情后海外涉华舆论和中国OFDI都受到疫情较大影响，本文数据截止到疫情刚刚发生的2019年底，研究期限为2009—2019年。在研究年限内，波黑、东帝汶、黑山、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在GDELT数据库中均没有涉及中国的新闻报道，本文剔除了这些国家，最终有58个沿线国家进入样本，总样本为638个。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为了避免异方差问题，本文对除*avgmean*、*cce*和*bni*之外其他变量进行对数转换。因为部分数据缺失严重，本文对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nr*）和东道国教育水平（*school*）进行插补。从表2中可以看出，涉华新闻舆论褒贬度的均值为2.8，标准差为2.798，舆论关注度的均值为0.38，标准差为0.16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华新闻舆论均值和标准差比较接近，即数据分布比较集中，东道国涉华舆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总体平稳。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分类	变量	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据来源
----	----	----	-----	----	-----	-----	-----	------

被解释变量	<i>ofdi</i>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万美元）	638	13.779	7.44	-0.693	26.938	商务部
核心解释变量	<i>avgmean</i>	舆论褒贬度	638	2.8	2.798	-3.006	9.212	GDELT
	<i>perread</i>	舆论关注度	638	0.38	0.164	0	3.033	GDELT
控制变量	<i>lngdp</i>	中国 GDP（现价美元）	638	24.548	3.718	0	28.696	世界银行
	<i>lndgdp</i>	东道国 GDP（现价美元）	638	29.879	0.309	29.26	30.27	世界银行
	<i>lnpergdp</i>	东道国人均 GDP（现价美元）	638	9.301	1.802	0	11.861	世界银行
	<i>lndistance</i>	两国首都距离	638	12.755	0.486	10.72	13.528	CEPII、IMF
	<i>lnbtrade</i>	双边贸易额（现价美元）	638	22.23	1.86	17.024	25.811	UNcomtrade
	<i>lntown</i>	城市率	638	3.998	0.427	2.799	4.605	世界银行
	<i>lnbusiness</i>	营商环境	638	4.198	0.887	0	4.599	世界银行
工具变量	<i>lnnr</i>	自然资源禀赋	638	0.921	1.554	-7.949	4.135	世界银行
	<i>bni</i>	正面舆论占比	638	0.809	0.306	0	1	GDELT
调节变量	<i>lnstudengt</i>	来华留学生	638	5.942	2.608	0	10.261	《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
	<i>lnnet</i>	软基础设施	638	1.48	1.824	-7.78	3.555	世界银行
	<i>cce</i>	政府腐败程度	638	-0.323	0.779	-1.688	2.217	世界银行
	<i>lnsc</i>	高校入学率	638	3.366	1.088	-0.01	4.745	世界银行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基准回归分析

从表 2 中第（1）-（4）列是以舆论褒贬度（avgmean）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1）列是没有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舆论褒贬度对 OFDI 的影响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正面舆论会促进中国 OFDI，而负面舆论会抑制 OFDI。（2）列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依然在 5%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国 OFDI，但是系数有所降低。验证了本文假设 1。（3）列和（4）列是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二期，在滞后一期时，舆论褒贬度正向促进中国 OFDI 但是不显著，滞后 2 期时，在 1%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国 OFDI，且影响系数增大。此结果表明，舆论褒贬度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且滞后的舆论偏向对 OFDI 的影响更明显。表 3

中(5)-(8)列以舆论关注度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5)列为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舆论关注度对中国 OFDI 的促进效应在 1%水平上显著。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这种促进作用得到了增强,当舆论关注度滞后 1 期是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促进 OFDI,当滞后 2 期时,并不具有促进效应。该结果表明,舆论关注度对 OFDI 存在滞后效应,但舆论关注的热度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验证了本文假设 2。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舆论的“质”——褒贬度				舆论的“量”——关注度			
	(1)	(2)	(3)	(4)	(5)	(6)	(7)	(8)
	0.427** (0.025)	0.388** (0.030)			1.575*** (0.000)	1.726*** (0.000)		
滞后 1 期			0.107 (0.716)				1.876*** (0.002)	
滞后 2 期				0.688*** (0.001)				0.952 (0.468)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168*** (0.000)	-202.8*** (0.000)	-128.2* (0.090)	-319.7*** (0.000)	10.76*** (0.000)	-128.2*** (0.000)	-101.4*** (0.001)	-119.2*** (0.002)
年份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国家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N	638	638	580	522	638	638	580	522
R ²	0.173	0.184	0.115	0.113	0.167	0.180	0.119	0.091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以下所有分析均控制了控制变量并使用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下同。

进一步分析:如表 3 所示,按照东道国涉华舆论趋势变化将 2009—2014 年分为东道国涉华舆论积极时间段,2015—2019 分为涉华舆论消极时间段。表 3 显示,2015—2019 年期间,舆论褒贬度显著为负,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舆论关注度会加剧负面舆论对中国 OFDI 的抑制作用;但在 2009—2014 年国际涉华舆论总体偏向正向积极时期,交叉项不显著,说明舆论关注度不会对正面与中国 OFDI 之间产生调节作用。部分验证了假设 3。

表 3 分阶段分析结果

	2009-2014	2015-2019
avgmean	0.472** (0.011)	-0.400 (0.301)
perread	-2.654* (0.498)	-3.16* (0.085)
Avgmean*perread	-1.299 (0.428)	-8.273* (0.063)
N	348	290
R ²	0.214	0.118

（二）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引入东道国赴华留学生、软基础设施、政府腐败和高校入学率作调节变量。为了避免由于交互项的加入带来的共线性问题，本文对构成交互项的变量首先做了去中心化处理。

如表 4 第（1）列所示，赴华留学人数对舆论褒贬度影响中国 OFDI 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与假设 4 相符；第（2）列显示东道国软基础设施水平对舆论褒贬度影响中国 OFDI 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说明宽带普及率越高，软基础设施越好，会弱化负面舆论对 OFDI 的不利影响，与假设 5 相符；根据第（3）和（5）列所中的回归结果，东道国腐败程度与舆论褒贬度的交互项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系数较大，东道国腐败程度对舆论褒贬度促进中国 OFDI 具有较强的弱化作用；但对舆论关注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与假设 6 部分相符。如第 6 列所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教育水平是舆论褒贬度和关注度影响中国 OFDI 的显著调节变量，其弱化了负面舆论对我国 OFDI 的不利影响，但强化了舆论关注度对 OFDI 的积极影响，验证了本文假设 7。

表 4 调节效应分析

	舆论的“质” ——褒贬度				舆论的“量” ——关注度	
	(1)	(2)	(3)	(4)	(5)	(6)
<i>Avgmean*lnstudengt</i>	0.0613*					
	(0.060)					
<i>Avgmean*lnnet</i>		-0.0980**				
		(0.023)				
<i>Avgmean*cce</i>			-0.221**		0.207	
			(0.018)		(0.866)	
<i>Avgmean*lnsc</i>				-0.115*		16.07***
				(0.059)		(0.000)
<i>N</i>	579	638	638	638	638	638
<i>R</i> ²	0.132	0.197	0.200	0.194	0.180	0.200

（三）内生性问题

内生性的主要来源是样本选择偏差、遗漏变量偏差和双向因果，参考经典文献将重要控制变量均加入模型之中以避免遗漏重要变量。本文重点考察舆论的逆向因果问题。

逆向因果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开始不断参与到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之中，在给当地带来资本和就业的同时也对公共政策和制度质量产生影响^[49]，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东道国涉华舆论偏向，因此，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本文选取工具变量并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参照相关文献^[5、50]引入舆论占比作工具变量，本文选用正面舆论占舆论总数之比作为舆论关注度的工具变量，即用月度正面

新闻报道的总篇数与月度总篇数的比值来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新闻报道总篇数是分母,因此该工具变量与原变量呈负向关系,结果应该与前述基础回归结果的符号相反。对于沿线属于高收入水平的国家,采用除该国之外的高收入水平国家涉华舆论均值作为此国舆论褒贬度的工具变量;同理,对于沿线属于低收入水平的国家,采用除该国之外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涉华舆论均值作为此国家舆论褒贬度的工具变量。在进行回归之前,对工具变量进行弱相关检验,并做内生性检验。经检验,前者不能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使用对弱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回归,异方差稳健 DWH 检验通过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表 5 第(1)列结果显示舆论褒贬度对中国 OFDI 仍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假设 1 相符。表 5 第(2)列结果显示舆论关注度为负,但正如上文分析,该工具变量与舆论关注度是负向关系,所以工具变量表明舆论关注度与我国 OFDI 也是促进作用,与基础回归结果一致。

表 5 内生性检验

	(1) 舆论褒贬度		(2) 舆论关注度
avgmean	4.719**	perread	-17.67*
	(0.014)		(0.077)
N	638		638
R ²	0.659		0.748

(四) 异质性检验

1. 文化异质性

受不同文化熏陶的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感知和认同程度存在差异。儒家文化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感知和认同度较高^[51],对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能客观理解,更能理性看待我国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舆论语气均值和减少负面舆论报道的数量。非儒家文化圈国家与我国文化距离较大,不利于东道国了解和认同我国文化,中国在东道国投资经营时,由于两国拥有不同的民族信仰,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差异较大,容易产生文化冲突^[54],对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更难于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舆论褒贬度和增加了负面舆论报道数量。本文重点讨论负面舆论在不同文化下对 OFDI 的作用,因此,本文根据文化异质性将样本分为儒家文化圈国家和非儒家文化圈国家。根据表 6 回归结果的第(1)和(2)列,儒家文化圈国家的负面舆论和舆论关注度对 OFDI 的影响均为正,在面对负面报道时,两国民众文化相近能降低负面舆论对 OFDI 的影响。非儒家文化圈国家关注度对 OFDI 均有抑制作用,舆论褒贬值不显著。

2. 城市化率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城市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高城市化率国家也伴随着收入高、教育普及率高、基础设施完备等,所以民众被舆论误导的概率低,故舆论的两边际会更积极促进中国 OFDI。低城市化率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教育落后,舆论传播依赖现代软基础设施,所以在低城市化率国家,舆论对 OFDI 作用低于高收入国家。因此,东道国城市化水平对舆论影响 OFDI 可能存在差异。参照相关文献^[52]用城市化率 50%作为中间水平,将高于 50%东道国分为高城市化率国家,反之则为低城市化率国家。结果如表 6 第(3)和

(4) 列所示, 在低城市化率国家, 舆论关注度对 OFDI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且其促进作用要高于高城市化率国家, 舆论褒贬度存在不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高城市化率国家, 舆论的两边际对 OFDI 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可能是在高城市化率国家, 民众一方面因为基础设施完善, 网络覆盖更全, 更易获得涉华新闻; 另一方面, 因为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多, 被舆论误导的概率低, 所以舆论的“质”和“量”都对 OFDI 的促进作用显著。

3. 收入水平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入水平差距大、数字化服务水平差距明显, 考虑到舆论的传播依赖当地数字化服务水平, 高收入国家可提供良好的软基础设施为公民提供了获取舆论的高效信息渠道, 相较于低收入国家获得涉华舆论信息更多更全, 所以有将其分组进行分组讨论。参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划分为高收入、中偏上收入、中偏下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四个收入组别。将高收入和中偏上收入国家划为高收入国家组, 低收入和中等低收入国家分为低收入国家组, 根据表 6 第 (5) 和 (6) 列结果显示, 涉华舆论的“质”和“量”对中国 OFDI 的影响也是有区别的。在低收入国家, 舆论褒贬度对 OFDI 有促进作用, 且促进作用强于基准回归的效应, 可能是因为低收入国家的数字化服务水平低, 涉华负面信息被少数人所关注到, 降低了负面舆论的抑制作用从而提高了正面舆论的促进作用; 舆论关注度对 OFDI 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在高收入国家, 舆论褒贬度对 OFDI 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舆论关注度显著正向促进 OFDI。可能是部分高收入国家媒体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带有一定的偏见^[15], 故在高收入水平国家负面舆论更容易被民众所接触, 但高收入国家良好的教育让民众有了较高的认知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偏误报道误导的可能, 两者综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舆论对 OFDI 的影响。

表 6 异质性分析结果

	(1)	(2)	(3)	(4)	(5)	(6)
	非儒家	儒家	低城市率	高城市率	低收入	高收入
avgmean	-0.211	1.820*	0.291	0.374*	0.812***	0.122
	(0.593)	(0.079)	(0.424)	(0.051)	(0.007)	(0.525)
perread	-7.114***	2.505***	5.413***	2.143***	-19.71**	2.064***
	(0.000)	(0.000)	(0.000)	(0.001)	(0.043)	(0.000)
N	240	50	205	433	242	396
R ²	0.119	0.479	0.259	0.215	0.223	0.239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用 GDELT 数据库中 2009—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所有涉华新闻褒贬度和人均涉华阅读分别作为舆论“质”和“量”指标, 研究东道国涉华舆论的两个边际对中国 OFDI 的影响。研究发现: (1) 东道国涉华舆论“质”和“量”均会正向促进中国 OFDI, 其中积极舆论促进中国 OFDI, 消极舆论会抑制 OFDI; 东道国涉华新闻报道越多越有利于我国 OFDI, 但随着时间的流失, 舆论关注度对我国 OFDI 影响会减弱, 这一结果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均得到证实。(2) 东道国赴华留学能显著的调节舆论褒贬度对 OFDI 的促进作用; 沿线国家受教育水平强化了舆论关注度对 OFDI 的积极影响; 东道国腐败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和沿线国家受教育水平都会弱化负面舆论对我国 OFDI 的不利影响。(3) 在不同文

化圈、不同城市化率和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东道国涉华舆论“质”和“量”影响 OFDI 都存在异质性,在非儒家文化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正面都显著促进 OFDI;在儒家文化国家、不同城市率和高收入国家,舆论关注度越高对我国 OFDI 越有利,而在非儒家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舆论关注度对我国 OFDI 存在抑制作用。

结合上文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政府部门加强“软实力”建设,扩大“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宣传力度,传播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共赢目的,树立良好国家形象,为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创立良好的舆论环境。(2)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构建从小学到大学全层次的交流合作机制,鼓励更多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访问,尤其需加强与非儒家文化圈的交流合作,帮助其正确理解我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和目的;(3)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数字基建合作、经验分享等方式,助力沿线各国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让更多的人的人可通过网络了解真实的中国。(4)从国家层面建立沿线国家涉华负面舆论预警机制,及时发布沿线国家舆论风险,帮助对外投资企业获得东道国全面而及时的舆论信息,减少企业投资风险;(5)我国企业应遵守当地规则,培养企业社会责任感,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积极关注东道国涉华舆论变化情况,减少投资损失。

参考文献

- [1] Du J, Zhang Y.F. Doe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mote Chinese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8,47(47):189-205.
- [2] Kulchina E. Media coverage and location choi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35(4):596-605.
- [3] 李钢,孟丽君.舆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美国进口贸易为例[J].世界经济, 2019(8):146-169.
- [4] 孟丽君, 李钢.逆全球化背景下媒介舆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J].财贸经济, 2021, (11):146-162.
- [5] 程盈莹,成东申,逮建.国际舆论对中国引进外资的影响:基于 Gdelt 新闻大数据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21(7):19-33.
- [6] 程盈莹,成东申,李佳鸿.国际舆论对我国入境旅游贸易的影响——基于 Gdelt 新闻大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 2022(2):113-125.
- [7] 刘勇.“一带一路”投资风险及其法律应对——以“尤科斯诉俄罗斯案”为视角[J].环球法律评论, 2018(1):175-192.
- [8] 李仲平.“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投资基础设施的法律风险与对策——基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 2017(5):1-8.
- [9] 张晓涛,王 淳,刘 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研究——基于大型问题项目的证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0(1):118-128.
- [10] 周经,王旭.“一带一路”倡议下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来自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经验证据[J].财经科学,2020,(03):80-91.
- [11] 曹亚军,胡婷.“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OFDI 的影响效应——投资流出和风险偏好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21(1):165-173.
- [12] 王建秀,邵利敏,任建辉.“一带一路”国家逆全球化遭遇程度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J].中国软科学, 2018(7):117-128.
- [13] 杨玲丽,汪伟民.社会风险对企业海外投资意愿的影响探析——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J].亚太经济,2020,(05):86-95+151.
- [14] 李亚波,杨荣海,张 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恐怖袭击对中国海外并购影响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20,36(8):68-80.

- [15] 张先锋,郭伟,蒋慕超,朱 晨.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与企业 OFD——基于东道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情感量化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21,(5):69-82.
- [16] Mutz D C.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Effects of Representations of Public Opinion on Political Attitudes[J]. Political Behavior,1992, 14(2):89-122.
- [17]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50(2):179-211.
- [18] Nye J S.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Why Washington Should Worry[J].Foreign Affairs,2004,83(3): 16-20.
- [19] Nye J S.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J].Foreign Affairs,2010,89(6) :p.2-12.
- [20] 吴颜芳,王 强.论经济报道中舆论监督功能的实现[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3,15-17.
- [21] 徐磊,王庆军.机遇、挑战与应对:5G 时代网络体育舆论传播[J].体育文化导刊,2022,(01):47-53.
- [22] Anderson S P,McLaren J. Media mergers and media bias with rational consumers[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2,10(4):831-859
- [23] Heinz M,Swinen J. Media slant in economic news: a factor 20.[J]. Economics Letters, 2015,132:18 20.
- [24] QIN B,Stromberg D,WU Y H. Media bias in Chin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8,108(9):2442-2476.
- [25] 殷 俊,邓若伊.论国际媒体负面舆论处置策略——以 CNN 卡弗蒂事件为例[J].新闻知识,2008,(08):53-55.
- [26] Bounie D, Bourreau M.Gensollen C M. The Effect of Online Customer Reviews on Purchasing Decisions:The Case of Video Games[J].Americas,2005,14(2):917-918.
- [27] 贾玉成,张 诚.国家形象对中国 OFDI 的影响[J].经济评论,2019,(4):108-126.
- [28] 孙国辉,刘培,杨一翁.国家形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19,33(6):35-45.
- [29] 邓路,刘德学.国家形象与出口——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7,(7):63-73.
- [30] 杨波,柯佳明.国家形象是软实力吗——基于跨国并购的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4):135-155+160.
- [31] 陈力丹.关于舆论的基本理念[J].新闻大学,2012,(05):6-11+21.
- [32] Tomkins C. Interdependencies,trust and information in relationships,alliances and networks[J].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1,26(2):161-191.
- [33] Jin S,Bluemling B,Mol A P J. Information,trust and pesticide overuse: Interactions between retailers and cotton farmers in China[J].NJAS-Wageningen Journal of Life Sciences,2015,72: 23-32.
- [34] Sandleris G. Sovereign defaults:Information.investment and credi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8 ,76(2):267-275.
- [35] 卢鹏.来华留学生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议题方略与实践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22,(2):154-159.
- [36] 韩永辉,王贤彬,韦东明,张 帆.国际教育交流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基于来华留学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22,44(9):19-34.
- [37] 谷媛媛,邱斌.来华留学教育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7,(4):83-94.
- [38] 周中胜,贺超,韩燕兰.高管海外经历与企业并购绩效:基于“海归”高管跨文化整合优势的视角[J].会计研究,2020,(8):64-76.
- [39] Mullainathan S,Shleifer A.The market for new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95(4):1031-1053.
- [40] 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J].管理世界,2012,(11):45-56.
- [41] 王永中,赵奇锋.风险偏好、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金融评论,2016,8(4):1-17+124.
- [42] 李延喜,任艺,陈利军,田 晓.中国 OFDI 提升了东道国社会福利吗?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J].投资研究,2021,40(9):27-45.
- [43] 李新春,肖宵.制度逃离还是创新驱动?——制度约束与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J].管理世界,2017,(10):99-112+129+188.
- [44] 蒋殿春,张庆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J].世界经济,2011,34(05):26-41.
- [45] 陈升,过勇.东道国营商环境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3):78-105.
- [46] 赵赛.基于制度环境视角的中国 OFDI 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国家的实证分析

- [J].经济问题探索,2022,(1):166-180.
- [47] 袁然,魏浩.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2):194-206.
- [48] 李景睿.收入分配、信贷约束对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影响研究——基于 146 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J].管理评论,2019,31(6):267-276.
- [49] Ramirez C D, Rong R. China Bashing: Does Trade Drive the “Bad” News about China in the US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20(2): 350–363.
- [50] 武昭媛,洪俊杰.国际舆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J].国际经贸探索,2022,38(9):1-15.
- [51] 杜朝运,詹应斌.儒家文化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59(6):95-106+221.
- [52] 张海伟,郑林雨,陈胜发.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22,36(1):53-63.
- 感谢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BGL050），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23B0319）的资助。

PROMOTING OR SUPPR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QUALITY AND ATTENTION OF PUBLIC OPINION CONCERNING CHINA ON OFDI

Yang Lizhuo, Fu Jia, Lv Ziming, Xu Qingyun

Abstract: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has become a new type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barrier, which hinders Chinese enterprises from investing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is paper adopts the expanded trade gravity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China's OFDI, collecting China-related reports and China's OFDI traffic data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during 2009-2019, from the two margins which are degree of praise or criticism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number of repor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Both the two ways promote China's OFDI effectively. 2) The corruption degree and education level of the host country moderate the effect public opinion influences China's OFDI negatively, while the corruption degree and education level of the host country moderate the effect. 3) The soft infrastructure level and education level of the host country exis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moderating the number of reports influencing China's OFDI. 4)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on China's OFDI is heterogeneous i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different urbanization rates, and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on preventing public opinion risk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invest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degree of praise or criticism of public opinion; degree of public attenti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